



日本学刊
Japanese Studies
ISSN 1002-7874, CN 11-2747/D

《日本学刊》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与亚洲合作进程——兼论区域共同体构建中的日本位相与趋向
作者： 吴怀中
网络首发日期： 2020-07-07
引用格式： 吴怀中. 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与亚洲合作进程——兼论区域共同体构建中的日本位相与趋向[J/OL]. 日本学刊.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7.D.20200706.1453.006.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与亚洲合作进程^{*}

——兼论区域共同体构建中的日本位相与趋向

吴怀中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加速构建。该战略的发展，从冷战后到世界开启大变局（1991—2017年前后），在单极体系即美国霸权下，经历了经济中心、政经合流、政略优先等不同导向和路径的三个演进阶段，并在范畴、内容、路径、取向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影响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架构和走向的三个主要宏观因素为日美同盟状态、中国崛起进程和日本身份认同。进一步对这些因素进行操作化，可以发现，在典型单极体系下，直接影响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制定的主要自变量是日美同盟状态、中日国力差距（能力对比程度），而并非中美关系。这两个变量的组合与互动产生出四个因变量，其中三个便是以上三阶段的差异化路径，第四个是根据三阶段路径推导出的因果关系的如下拓展分析：进入2018年后，国际变局加剧，日美同盟状态与中日实力差距的两个自变量发生“谐振”，加上之前被视为先验条件的单极体系自变量与美国霸权渐行剥离、亚洲融合及一体化进程显现新态势，导致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发生明显的策略性调整，朝着多向对冲、政经并重、回归亚洲、深耕地区的趋向位移。此调整为某种战略动向的端口和序曲，将在曲折反复中持续较长时间，总体上有望为亚洲区域合作与融合、深化共同体建设提供相对利好条件。

关键词：区域主义战略 共同体构建 国际变局 亚洲合作

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0)03-0001-4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我国对策研究”（编号：17AGJ009）。

^{*} 本文在表述上选择使用“亚洲”而非“东亚”或“亚太”的原因在于，东亚合作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过大且在多数时段因“历史忌讳”不是日本政策主流，“亚太”被许多合作机制冠名使用却失于空洞泛化。实际上，日本学者经常混用东亚、亚洲或亚太，其间的区别相当程度上是主观的，具有伸缩性。本文所指的亚洲概念及范围介于东亚和亚太（以及印太）之间，是一种为行文方便，在地理或地缘政治上代指日本地区归属意识及其行为的折中概念。

“区域主义”亦称地区主义 (regionalism), 是指处于某地理范围的复数国家为了域内的繁荣与和平等共同目标而推动相互间协调、合作与整合的志向与观念、理论与实践。它往往伴有域内国家在共同志向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区域规则和制度、通过共同行动实现一体化的现象, 既可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方面, 也可是综合性的。^① 因而, 日本的区域主义战略即指, 推进日本版区域主义构想的各种努力与举措、并以区域整体层次的协调与合作等安排来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与方法。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所用“区域主义战略”的概念大于“区域合作战略”, 与“区域战略”大部分重合但两者相比具有如下三点相异: (1) 至少在名义或自称上, 前者是一种在推动区域联合或部分整合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 而后者往往不是。(2) 前者不重点处理区域战略中常见的国别行为尤其大国博弈或行为体双边互动等。(3) 前者以本地区 (亚洲) 为地缘对象, 后者涵盖与日本所属地理区域之外区域的联系, 如日欧合作等。^②

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服务于日本国家战略, 是其对外战略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关键因素。日本的国家身份及战略目标, 在各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侧重点, 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目标也随着国家身份及战略目标的调整而变动, 存在着从二战后逐步演进并丰富成型的过程。^③ 总体看, 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在政策志向上, 从被动接受并利用地区秩序来有所作为, 转变为主动塑造格局和秩序来维护及实现国家利益; 在内容上, 从偏重经济合作扩展到政治、经济和安全, 内涵逐步丰富化和均衡化, 即从经济区域主义到政治与安全区域主义;^④ 在地理范围上, 由小到大逐渐扩大并跨域实现广域覆盖; 在手段上, 由重视经济贸易工具发展到重视外交和安全举措; 在战略重心上,

① 《政治学辞典》,《团结》2010年第5期。

② 中国知网 (CNKI) 数据显示, 以“日本”+“区域 (地区) 主义”为主题词检索, 所得相关论文仅有五篇左右, 其中关联度较高并属于 21 世纪的主要成果为: 唐永亮和白如纯《新东亚主义: 探索、挫折与出路》(《东北亚学刊》2014年第6期)、贺平《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 日本—欧盟 EPA/FTA 初探》(《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王少普《日本的新区域主义及中国的外交选择》(《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以“日本”+“区域 (地区) 主义战略”检索, 所得结果为 0 篇。以“日本”+“区域合作” (或+“经济贸易”、+“东亚”、+“亚太”) 进行检索, 所得论文众多但与本研究主题存在相当差异。可见, 从历史演变、战略总体等视域研究本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

③ 山影進「日本の地域構想と中国の台頭」、大庭三枝編著『東アジアのかたち—秩序形成と統合をめぐる日米中 ASEAN の交差—』、千倉書房、2016年、205—239頁。

④ 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 日本的国家大战略事实上就是“吉田主义”, 其重视的国家利益排序是繁荣 (经济)、安全、价值。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也呈现出以经济为重和贸易先行、政治和军事安全随后跟进的特征。

逐步由“向西倾斜式”即“美国太平洋式”向东方亚洲（东亚）、亚太和印太取得一定扩大和平衡；同时，在重要的相关大国关系及重要行为体的处理上，对美国从采取“绝对首要”到“相对首要”，对中国从采取“相对重视”到“绝对重视”，以及对其他行为体逐步兼顾考虑等。

冷战结束至今，亚洲国家塑造本地区体系的能力与意愿大幅提高，并极大地影响世界体系的特征，亚洲区域主义与共同体构建的时代逐步到来是不争的事实。^① 其中，日本周期性地操弄区域主义，在合作倡议及制度构建等方面做出了或参与、或发挥核心作用的一系列举措，不乏促推相关构想蓬勃发展却又导致其半途而废的事例。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范畴、架构、重心和指向频繁变动调整，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这一特性非常罕见和明显。^② 例如，日本大约每五年周期性地推动多种区域政策设计与路径的更替。^③ 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和讨论如下核心问题：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演进历程为何、有何特征，又受到哪些因素即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通过何种因果机制影响区域主义战略构建和演变过程？根据这种历史梳理提炼的变量间因果规律与分析框架来推导当今正在或将要发生的现象与趋向，或可提供一些政策启示，这对亚洲共同体构建以及中国相应的国际战略及对外倡议有何影响？具体而言，即在中国倡导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伙伴关系理念的今天，日本的认同和中日协调是其不可或缺的实施条件，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显示的特征和趋向，是否含有契合推进新时代共同体建设的新要素和动力？

一、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历史轨迹

冷战结束至今，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亚洲政治概念范式，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解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

^① 区域共同体是区域主义发展到顶点的一种表现形式。参见：伊藤憲一「日本外交と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外交』2010年9月号、60頁。

^② 例如，美国二战后重视的三大战略地区一直是欧洲、中东和东亚，当今俄罗斯相对看重的是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和中亚等板块，中国则一贯重视与周边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③ 从冷战结束前后开始，日本一直在推进某种地缘概念及区域主义战略路径的操作和调整。这种调整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体现、重点和指向各不相同，大致算来在五年左右的节点上基本都有重大动向：1993年第一届APEC峰会所代表的“亚太经合”及多边主义、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0+3”版东亚合作、2002年小泉版“东亚共同体”即“10+6”版“扩大的东亚”合作、2007年前后安倍政府“扩大的亚洲”设想（即“两洋交汇”“自由与繁荣之弧”等）、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版“亚太再平衡战略”、2016年之后的“印太战略（构想）”等。

区域主义战略的指向与发展，从冷战后到 2017 年左右，经历了经济中心、政经合流、政略优先的三个导向各异的演化阶段，在框架、范畴、指向等方面呈现每隔五年左右就进行重大调整的动向，且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主打内容和侧重点。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其战略的特征和规律。^①

（一）经济中心、合作导向的区域主义战略

冷战结束及两极格局崩塌，区域主义在全球化浪潮中得以复兴并再次受到重视，这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行为体提供了支持区域多边机制与经济合作的激励。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日本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主义（如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90 年代后期尤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偏好东亚合作并对“东盟 + 中日韩”（即“10 + 3”）的区域主义进展发挥了作用。而且，不管是 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还是“10 + 3”机制，日本对它们的姿态和路径总体上都是以合作、包容及多边协调为导向。

1. 亚太经合、多边志向与日本（冷战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

冷战结束前后，国际秩序变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区域论坛和多边机制的扩散。20 世纪 90 年代初，政治军事对立阵营消失，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经济活动与资本流通到达全球，让亚太经贸往来首次连为一体，政经一体的互联互通和亚太统一市场基本实现；并且，美国对亚太合作表现出积极姿态，也着力推动亚太多边倡议。^② 亚太地区更大范围的新多边倡议的发展具备了条件，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区域主义开始出现，这也是日本此前从未参加过硬性区域机制却就此开始推动区域合作战略构思的大背景。

这个阶段日本的区域主义战略，是积极支持新兴亚太多边机制的发展，构建自己的影响力，其努力的战略重点有两个，即 APEC 和 ARF。首先，在经济贸易领域，最明显的特征是积极参与 APEC 而回避东亚合作，利用 APEC 覆盖亚太全域的特点来维护地区开放的自贸体系——这一体系被日本认为是其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大环境和前提条件。其次，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尽管很谨慎，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发挥引领作用，积极赞同并参与推动 ARF 的

^① 笔者数年前与日本学者大庭三枝就日本区域主义政策进行过探讨，在 2012 年撰写《日本的亚太战略》一文时对日本区域战略进行过简要的分期梳理，与大庭近期的论文（「現代日本外交の 30 年」、『国際政治学』2019 年 3 月号）在部分观点和结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② 美国政府大力支持成立 APEC 部长级会议，该会议于 1989 年 11 月在堪培拉开幕。1993 年 11 月，APEC 第一次首脑会议在西雅图举行。

成立。一般认为，这与1991年的“中山倡议”、1993年的“宫泽谈话”等有关。^① 尽管日本肯定不是 ARF 成立背后的唯一力量，但日本的倡议为亚洲新兴的安全多边主义提供了重要支持。1994年8月，作为亚洲第一个专门为解决安全问题而设立的机构，ARF 举行了首次会议，这是地区安全保障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这一时期，日本对亚太区域多边主义兴趣日增。1994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委托朝日啤酒公司董事长樋口广太郎组织“防卫问题恳谈会”进行了一项研究，以考察日本国防政策的未来，该恳谈会提出的“樋口报告”敦促日本采取“多边安全战略”，包括更加重视亚太区域安全对话等。^②

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日本就在亚太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并先后提出过“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太平洋合作会议”（PECC）等倡议。^③ 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一直大幅扩张。到90年代初，日本制造业企业在亚洲的投资已超过北美。1991年，日本与亚洲邻国的贸易超过了对美贸易，并保持了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1995年这种顺差达600亿美元的峰值。然而，由于种种限制和担心（主要是对美关系），日本并没有主动地进一步尝试推进亚洲或亚太区域主义的发展。以1989年APEC的设立为契机，“亚太”的框架开始成为潮流，而冷战的结束也促使日本开始显著地参与亚太地区多边主义。其时，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日本对日美双边关系的信心受到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日益激烈的日美双边贸易争端的影响而动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北美一体化进展迅速。1993年美国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一进程在日本引发了担忧的声音，担心北美将成为类似欧盟的保护主义贸易集团。如果这些地区合作架构成为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排他性贸易集团，那对靠全球自由贸易赢得发展和繁荣的日本来说可谓是大祸临头。对日本来说，APEC可成为对抗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浪潮的重要力量，亚太以市场为基础的开放区域主义可作为通向自由多边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垫

① 菊池努『APEC—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模索—』、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95年、259—277頁。

② 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模索—』、読売新聞社、1997年、326—328頁。这一报告在当时引起了美国对日美同盟的忧虑和对日本动向的警惕，即开始担心日本战略思维的明显转变。不过，也不应夸大日本在此期间向亚洲倾斜的趋势，因为没有多少主流声音呼吁对日本外交政策进行彻底的改变，也没有多少可信的行动来支持这一改变。日本尽管对亚洲或东亚的兴趣日益浓厚，但拒绝该地区的任何“排美性”概念，坚持要求APEC必须包括北美成员。

③ 菊池努『APEC—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模索—』、143—156頁。

脚石，因而颇具吸引力。^①

为了牵制和防止潜在可能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并确保亚太地区自贸经济体系，日本积极构思和推动亚太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架构。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区域主义志向，日本精英层的头脑由是开始真正显现亚太时代到来的愿景。一般而言，APEC 的成立，除了澳大利亚（最初是澳大利亚的倡议），日本在创建 APEC 机制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通商产业省和经济企划厅被认为在背后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②

2. “10+3”版东亚合作的发展与日本（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起，亚太区域主义的发展势头开始偏向部分排除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东亚”一边。日本朝东亚合作的方向靠拢和迈进，并对东亚区域主义的进展做出了贡献。这也成为日本“首次将之前敏感的东亚作为独立区域来认识”进而参与东亚经济合作的“新的一大转机”。^③ 此期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是日本的区域合作战略或曰区域主义外交的重心向东亚大幅倾斜时期。日本渴望在塑造亚洲经济合作机制方面发挥更大领导作用，并认为在东亚这个舞台或地缘场域能占据对华优势地位——实际上直到 2003 年，日本连续 12 年位列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当时，日本在东亚寻求更大领导作用的地区战略冲动的大胆程度令人惊讶。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通过双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该地区提供了约 800 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当时世人的感受是：“日本的力量实在太太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地球北半部分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世界的任何发展都将受到日本巨人的摆布。”^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之前由于顾及美国猜忌，日本对自 1990 年以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经济合作构想”（EAEC）始终持消极或回避态度。^⑤ 实际上，“东亚”这一地区概念相对较新，马哈蒂尔提出 EAEC 构想前，整个东亚都没有强有力的区域主义概念框架。当时，推进东亚一体化、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加以整合的构想还没有足够牢固地确立，无法获得形成更大框架范围的区域机制所必需的共识。

① 田中明彦『アジアの中の日本』、NTT 出版、2007 年、100—110 頁。

② 渡部昭夫『アジア・太平洋の国際関係と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148—150 頁。

③ 渡部昭夫『アジア太平洋連帯構想』、NTT 出版、2005 年、147—149 頁。

④ 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Iss. 3, November 2000, p. 360.

⑤ 伊藤憲一・田中明彦監修『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日本の針路』、NHK 出版、2005 年、36—39 頁。

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地区各国一直努力确保在危机时期获得正式的流动性支持。受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带动，日本在认识上有了较大改变，在金融领域提出了规模达 1000 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也发起了“新宫泽构想”——这成为后来“清迈倡议”的基础，以帮助亚洲地区经济体应对未来的货币危机。^①同时，1998 年“10+3”、1999 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得以启动，日本的提议或支持也是这种区域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当时，该区域各国间加强联系可以部分归因于成功建立了“10+3”这一东亚合作平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阶段性构想。依靠金融和经济安排的成功，“10+3”机制迅速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非正式但有效的经济区域主义形式，在某些日本精英眼中，它成为实现整体战略的最佳区域主义手段，可解决经济和安全问题，产生区域认同，从而实现东亚共同体所承诺的区域主义愿景。^②

日本态度的变化，在当时引发了这是否有可能催生诸如东亚自贸协定之类的区域机制的猜想。如下两个动向似乎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首先是日美关系的一时龃龉。1998 年，克林顿总统绕过东京直访北京，加剧了日本对被忽视和被抛弃的潜在恐惧。并且，两国政府还在应对亚洲经济危机的有效方式上发生严重分歧，华盛顿对东京向亚洲提供巨额援助无动于衷，反而严厉批评其未能通过吸收该地区的出口来帮助亚洲。当时有评论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关系跌至战后最糟糕水平。美方甚至警告称，由于日本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加强与邻国的关系上，美日同盟将难以管理和维持。^③其次，日本对亚洲多边主义的热情似乎多有消退。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与其说是亚太多边主义的领导者，不如说反而成了障碍：日本拒绝批准将农业等受到高度保护的行业纳入 APEC 自由化议程，对 ARF 的承诺也因认为其进程缓慢和过于关注东南亚安全问题而减弱。^④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日本因其经济总量（GDP）仍遥遥领先中国、日美同盟经过“再定义”而趋于稳固，所以仍有足够的自信以“10+3”框架推动东亚合作构想。不过，这个时期日本已开始战略和安全领域对华抱

① 進藤栄一『東アジア共同体をどうつくるか』、ちくま新書、2007 年、40—42 頁。

② 添谷芳秀・田所昌幸編『日本の東アジア構想』、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4 年、149—163 頁。

③ 榊原英資『日本と世界が震えた日』、中央公論新社、2000 年、185—186 頁。

④ 1998 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虽然继续赞美两个地区性机构的重要性，但政策说明的重点已明显转向东亚。

有戒心和疑虑，对朝鲜半岛核安全形势抱有不安。^① 这为其后日本开始重新评估对华关系及东亚区域主义的合理性和利益性埋下了伏笔，冷战后新的地缘政治变量对日本区域战略决策开始发挥效力。实际上，短短几年后，日本对东亚的未来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所持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弱，其“东亚雄心”开始消散。

（二）政经合流、政略上扬的区域主义战略

由于上述一些因素，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 APEC 僵化停滞以及中国发力崛起，日本小泉纯一郎政府对“10+3”版东亚合作的雄心明显下降，转而将扩大的东亚以及基于此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区域主义战略的核心。新保守主义者小泉的继承人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后，进一步在其战略中增加了针对中国的成分及地缘政治目的，将扩大的东亚合作提升为扩大的亚洲构思。很明显，这个时期日本的主流区域主义战略显示出政略上升、政经一体的倾向。

1. “扩大的东亚合作”——“小泉版”东亚共同体构想

东亚经历 20 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后，域内合作开始兴起和加速。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谈判迟迟未见效果，APEC 同样陷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小泉上台执政之际，日本受到中国大力推动东亚合作的影响，例如 2001 年中国与东盟展开自贸谈判，对日本的区域主义指向造成了莫大冲击。日本的自信也大不如前，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几年里，其疲弱的宏观经济表现和金融业的严重危机甚至一改昔日亚洲政经格局——外界对日本在构建亚洲地区秩序方面力量过大的担忧，转变为对其在处理自身经济和金融混乱方面力量过弱的指责。

基于此，日本开始真正把扩大的东亚与日本经济视为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2002 年初，小泉首相出访东盟五国时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EAC）设想。2003 年底，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发表《东京宣言》，亦提议构筑东亚共同体。^② 大约从那时起，日本把以 WTO 为中心的全球主义和以 APEC 为主的亚太主义进行了方向转换，即切换到重视推动日本版“东亚共同体”并与中国展开东亚合作主导权的竞争。^③ 此后大约十年，日本一直在推动和落实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并以提倡“10+6”版东亚合作来防止中

^①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东北亚发生了从朝鲜半岛到台海的一系列安全危机。其后，日本开始重新评估其安全政策，1995 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周边事态法”、《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因而相继问世。

^② 山影進編『東アジア地域主義と日本外交』、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03 年、4—7 頁。

^③ 谷口誠『東アジア共同体』、岩波新書、2004 年、「はしがき」、1—12 頁。

国在“10+3”框架内形成主导优势。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以“10+6”形式举行，日本被认为“如愿以偿”。然而，事实却是，“东亚峰会显得很奇怪，既不能代替‘10+3’的功能，也不能单独拥有明显不同的机制”。^① 此期前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议论东亚共同体构建的热潮，政官财学各界都发布了相关政策咨询报告，却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小泉政府也被认为没能为此构建出系统的政策。^② 这个时期，日本推动“扩大的东亚”构想举措的具体案例还有，2005年提议“东亚综合经济合作”（CEPEA）构想，以进一步推进“10+6”的区域一体化。同时，小泉政府竭力抵制或消极对待中国支持的“10+3”形式的地区一体化即“东亚自贸区构想”（EAFTA）。到2011年，中日被认为达成相互妥协，停止“内耗”，共同支持东盟提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从形式上看，“10+3”和“10+6”的模式由此被整合为RCEP。RCEP的谈判于2012年得以启动，但进展殊为不易，且亚太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巨变，日本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期的地区合作兴趣点及政治资源实际逐渐转向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③

此期，出于对中国长期意图及未来走向的疑虑，小泉政府重新评估其新生的亚洲战略及强化与东亚关系的承诺，并通过“小泉—布什”蜜月关系重新强调日美同盟纽带。从此阶段起，日本对东亚的未来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所持的乐观态度明显消失，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也因此开始带有地缘政治考量成分：意识到“中国对手”的存在，掺入针对特定竞争对手的政治色彩。尽管这在当时还不十分明显，但在之后的安倍“两洋交汇”论中得到了延续和放大表露。

2. “扩大的亚洲”构想——“自由与繁荣之弧”与“两洋交汇”

2006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执政后，其本人及麻生外务大臣分别提出了“两洋交汇”与“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两种构想的地缘构思出发点，主要是包括但不限于在更广阔的亚洲地缘框架内进行广域合作并制衡中国。安倍执政不到一年便匆匆卸任，2007年接任的福田康夫首相则对这一设想并不认同，且其因价值观与地缘政治色彩过于明显而得不到两洋的美澳印诸国与弧形地

^① Nair. Deepak, “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 A Frustrated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1, No. 1, April 2009.

^② 参见吴怀中：《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解析》，《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田中明彦『アジアの中の日本』、308頁。

^③ 大约从此期前后开始，TPP与RCEP这两个巨型区域项目之间展开了竞争，但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兴趣明显在于前者。

带国家的响应,^①上述构想及倡议基本“人走政息”,半途而废。此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安倍政府提出的“两洋交汇”等“扩大的亚洲”概念,在政策思路上已显示其后“印太”战略的雏形。第二,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2009年前后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论”,虽然该论持续时间短暂、难以成为政策主流,但也说明有少部分日本政治精英即“亲亚国际派”势力在这个时期对于高调改变日本此前的区域主义战略方向与路径持有异议或反对态度。^②

也即从此时开始,日本的区域主义与地区合作构想带有明显地缘政治与综合国际战略导向,并用“价值观外交”即意识形态工具,从地缘战略角度设计含有特定政治色彩与目的的地区合作构想。尽管从理论上说,中日间不应存在“守成国”与“新兴国”的体系竞争,但因二战后甚至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占有的先进产业及优越经济地位,其带有守成大国视角的身份站位或认为本身就是美国制度霸权组成部分的意识,使其对发生的地区权力转移反应非常敏感,试图维持相对收益并延缓区域经济主导权衰落的趋势。因而,在2010年中日GDP对比发生逆转的前后若干年内,两国间发生了类似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冲突。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实际上已超出单纯的区域合作志向而变频扩展为一种地缘综合战略,政治与安全因素由是逐渐演变为日本对外战略的必要“戏码”。从此,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摆脱了对外政策即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单纯或只能以对外经贸为工具来构思对外战略的战后传统模式,开始正面构思并构建由“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抗衡性地缘政治战略”组成的政策模型。

(三) 政略优先、秩序拼争的区域主义战略

由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崛起、中日GDP逆转,日本在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推动日本版“再平衡”实施以及主打日本版“印太”战略的进程中,大幅强化针对中国的指向和秩序之争要素,即便在TPP、亚非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贸领域,日本也赋之以鲜明的竞争、

^① 2009年日本民主党胜选后由鸠山由纪夫组阁,鸠山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即东亚共同体的愿景。鸠山急于在一个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推动日本的发展,以图阻止日本的相对衰落。但是,鸠山的理念基本没有付诸实施,虽有一定的思想代表性——代表了一股“亲亚国际派”对主流的亲美国国际派与亲美保守派的反击与抗争,却缺乏实际政策作用。其构思的“10+3”版东亚合作,相对于“10+6”版合作机制在日本政坛已是少数派意见。同时,由于鸠山的“入亚脱美”过于敏感而受到美国压制,加上2010年中日关系恶化,其理念在国际和国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某种意义上,在这个阶段,安倍的“两洋交汇”即“扩大的亚洲”构想与鸠山的“东亚共同体”理念,都因“超前”于时代而没有结果。两者的倾向有“左右”之分,安倍的“向右超前”作为政策主流脉络于十年后被修成了“印太”战略。

^② 安倍曾提出日美澳印“民主四国”联盟,但其他三国反应平淡,无意联手组织对华包围圈。

抗衡与排他筹谋。其区域主义战略蜕变进化为以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为导向的现实主义权力志向的综合政略。

1. 日本版“亚太再平衡”战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区域合作战略的指向再次向“亚太”倾斜。但此“亚太”非其推动APEC时所持的亚太概念，而是积极追随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针对中国又排挤中国的划圈意识的一种地缘战略概念。其发生背景是：（1）客观上，亚洲区域主义及地区合作的潮流再度向“亚太”深化拓展。2010年，“10+8”版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启动。2011年，美俄加入“10+8”版东亚峰会。（2）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重视亚太区域及多边机制，从安全与经济两个方面积极推动“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工程，并于2010年加入推进TPP谈判。（3）对日本而言，东亚平台无论怎么扩大，也难以装下其多重区域战略构想，特别是2010年后，其日益感到在逼仄的“10+3”舞台已难以应对“大块头中国”的崛起。搭车美国、“重返”亚太，可以实现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多重目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围绕中国展开的，即政治竞争、安全防范、经济挤压，总体上是一种接触加防范但不断加大防遏的构想。

这个阶段（2012—2016年），日本版“亚太再平衡”区域战略紧随美国，分为安全和经济两个主打方向。在安全领域，为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强化日美同盟、打造日美军事一体化及全球化体系，于2013年及2015年分别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于2014年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同时军事介入南海及两洋一线，倡议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等。在经贸领域，则是“一实一虚”两招。日本加入并积极推动TPP谈判，是实锤举措，从TPP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全力攻关并“成功”两次。但据各种测算，实际上无论是TPP还是CPTPP，对日本经济的拉动效果比较有限。^①而同时参与RCEP谈判及中日韩FTA，则多为虚招。日本对TPP谈判投入巨大精力和资源，是因为将TPP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中心平台和重要试金石，旨在防止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广域贸易秩序，阻止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向中国利益倾斜，从而在经济源头上应对中国的崛起。^②并且，这与TPP背后的日美同盟三重地缘利益高度契合：维护和

^① 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日 EU・EPA 等の経済効果分析（概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55375.pdf> [2020-02-03]。

^② Michael Auslin, “Getting It Right: Japan and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1, May 2012.

扩大美国在亚洲事务及区域主义中的影响力、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领导制定区域经贸规则以及亚太自贸区（FTAAP）标准。

2. 安倍政府“印太”战略（2016—2017 年）^①

日本的印太战略是在其“随美型”亚太战略构思部分破产后，在中美“一进一退”、中国被认为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主导亚太及印太秩序构建的现实刺激下，由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发酵而催生的一种区域战略。这也显示出，对日本而言，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范畴已超出亚洲扩展至印度洋与非洲。该战略一开始具有很强的政治排他、安全对抗与经济竞争的色彩，更多地属于一种排他性的“搞小圈子对抗”和地缘政治筹谋，主要目的即是以日美澳印联合牵制中国。^②

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演进和明确化的过程，基本成型与初步推动始于安倍政府正式宣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6 年 8 月，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标志着该战略作为日本的一项新外交战略正式出笼并初步成型。^③ 该战略在初始期着重强调自由与民主主义、法治、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点，但实际可归结为两大核心目标——秩序维护与经济竞争，这就内含了排挤中国的逻辑。^④ 首先，秩序维护主要是指保持自由与民主主义的价值基准与宏观政治秩序、基于国际法治和规则的海洋秩序（包括所谓的航行自由、海洋安全等）。实际上，印太概念的兴起本身就与中国的崛起有关。日本担心，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及亚洲安全观等积极进取的对外战略，中国可能会根本颠覆亚洲的全盘秩序。^⑤ 广义上，日本自 2017 年初开始主导 TPP11 谈判并最终使得 CPTPP 在 2018 年 3 月签署，也可视为其抢占区域规则与秩序制高点、争夺广域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举措。^⑥ 其次，在经济竞争方面，日本的目标是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对冲，扩大日企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份额，确保日本利益，具体抓手则是推进以亚洲为重点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

① 此为狭义划分，印太“构想”作为区别于“战略”的新阶段动向之一，将在第三节加以论述。

② 《王毅：再挑起冷战已不合时宜 再搞小圈子对抗更没有市场》，新华网，2018 年 3 月 8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8/c_137024207.htm [2020-02-03]。

③ Shinzo Abe, “Addres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Six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 VI Nairobi), http://www.mofa.go.jp/afr/a2/page4e_000496.html [2020-02-19]。

④ 大庭三枝「現代日本外交の30年」、『国際政治学』2019年3月号、110頁。

⑤ 同上书，第109頁。

⑥ 田中明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の射程」、『外交』2018年1・2月号、39頁。

伙伴关系、日印主导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以及日美澳印之间的共同开发与投融资合作等。^① 实现以上核心目标的主要抓手和工具，则是作为指导性联盟的日美澳印四边合作架构即“四边机制”（QUAD）。^②

从2017年后期到2018年，因美国对外战略不确定性显增、中日关系开始大幅改善回暖、四边机制与东盟的“印太”立场与政策各不相同等因素，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开始部分调整，强调开放与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协调等公益性和公共产品性，并不得不摸索与中日关系发展不相冲突的“印太”构想——“日美同盟+日中协调”的相对均衡局面。^③ 因此，日本的“印太”政策设计以2018年前后为界，大致可分为“战略”与“构想”两个演化阶段。

二、研究启示：历史特征、演变规律与分析拓展

通过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演变的历史梳理，可发现其在范畴、内容、取向、实施等方面存在诸多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对促使战略转变的因素进行评估，可提炼出重要的自变量因素的宏观作用力与规范性影响。对这些变量因素的操作化，或能清晰揭示变量造成的逻辑链与因果关系，从而对拓展研究新时代（2018年以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现状与趋向提供一种分析框架。

（一）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特点

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总体特点是：国家战略志向作为“底色”不断推动战略的框架、范畴、内容与姿态呈现扩大、丰富、走高的轨迹，身份站位与意识形态（价值因素）作为影响因素从内部调节或塑造战略的属性与配置，美国因素及日美同盟状态、中国因素及中日国力对比程度作为自变量从根本上规范着战略的架构与走向。

1. 总体上，除了冷战结束后的一段特殊时期^④，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地理范畴与经营内容越铺越大，框架与机制不断提级扩容。其呈现的演进轨迹反映在“东亚”“扩大的东亚”“扩大的亚洲”“亚太（升级版）”以及“印

^① 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强调投资的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可行性、受益国财政健全性等标准。

^② 孟晓旭：《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43页。

^③ 卢昊：《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20页。

^④ 在东亚，20世纪90年代初盛行一时的“亚太”概念，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被“东亚”这一狭小地区概念所取代。其后，随着东亚峰会的召开，“亚太”概念得到了“修正使用”而不是简单重现。

太”等多种构想版本的连续递进过程中。这些框架与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围绕日本的区域愿景以及国际形势认知的调整而出现。可以看到，每隔五年左右，日本地区主义的概念和范围都有一个较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是日本区域主义经验的五个主要标志，与其他国家对比，日本的这种频繁调整是一种并不自然的战略动向。从成因上看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主动原因，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志向越来越宽泛宏大的趋势，例如“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应该就是安倍再次执政后欲以“俯瞰地球仪外交”视野在全球发挥日本作用的志向的体现。第二是被动原因，反映国际形势和地区环境变化对日本造成的巨大压力所导致的应对型调整。例如，2003 年，日本从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位置跌落前后，其区域战略构想的地域及框架以“扩大的东亚”为肇始日渐扩大；2010 年中日 GDP 对比发生逆转后，日本的区域主义战略扩容趋向则更加明显。这些调整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增加“分母”，动员更多力量稀释或制衡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又如，安倍政府“印太”战略至少部分反映了世界政治重心由于印度崛起、非洲发展新局面而从太平洋逐渐转向印太两洋的现实。

2. 日本的区域主义战略构想，有一个性质和内涵日益丰富、立体和正常的演进轨迹。从经济到政治再到安全政策领域、再到顶层秩序维护和建构的过程，反映的是日本国家身份及战略走向的一种变化趋势。例如，日本初始涉足地区领导地位是在经济领域，主打经贸合作而非政治权斗。经济利益因素显然是日本向亚洲倾斜的催化剂，但随后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变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时间越往后，除了经济内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不断加入更多反映该地区战略前景的力量平衡和其他现实政治的政策内涵，设置更多的价值观标准与秩序框架等。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与财政因素。日本仍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其主导地位已今非昔比。日本政府虽继续严重依赖经济手段在该地区建立影响力，但其有效性渐受限制，日本发现自己在亚洲施加影响力的传统方式越来越难以维持。^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被迫发展在该区域建立和行使影响力的其他手段。第二，战略及政略因素。此乃日本国家“正常化”及政策手段丰富化的投影。例如，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日本区域主义构想越来越与作为国家战略目标顶层设计的国际秩序构建及

^① 实际上，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加上人口老龄化，日本的医疗和福利体系随时间的推移，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可能迫使日本削减支出，并将资源从对外援助计划等外交行为中重新分配出去。

规则维护连接在一起。尤其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战略自主性增强，在“俯瞰地球仪外交”框架下，其宏观视野和战略意识较前提升，又值美国“退群卸责”和战略收缩，所以出面挑头维护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冲动及表现急剧增多。

3.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多是中途植入的“素材”。此种植入有两面性：既有日本从二战后自身发展历程得到的经验与信仰，也有十足功利的工具理性成分与取向。从“扩大的亚洲”开始一直到“印太”战略，日本的区域主义战略一直都强调“西方普遍价值”（价值观外交）和意识形态因素。按照日方主流学者的分析，坚持“价值观”外交，既有正当性，也有工具性；正当性是指日本政府认定“西方普遍价值”及其规则与秩序既是日本也是世界得以繁荣与安全的保证，工具性则是指明显带有地缘政治和竞争目的，即拉圈子以排挤“异质者”中国，这一趋向随着中国崛起加速而明显化。^①但是，从中国来看，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工具主义色彩无疑更浓。例如，日本外务省2019年1月提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三大支柱”，其中删去了过去一直提及的“基本价值”（fundamental values）一词。^②同时，不似欧美，日本缺少原创的现代核心价值体系、第一层级的核心文明元内核，再加上近代史上长期对现代文明及价值观的违背与恶用，在战后几十年的历史中，日本并没有像部分欧洲国家那样对“价值观”外交的迷思和盲信。此外，日本的立场和态度易受美国影响，当美国对“意识形态”“价值观”采取消极和实用主义政策时，例如特朗普并不经常对外强调“人权”“民主”，则日本在此方面的调门就不会太高，也会把握“火候”，不正面突出价值观议题。

4. 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始终顾虑美国因素，深受日美同盟状态及美国对外战略影响。日本很注意在其战略中拉入美国，认为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构想有诸多便利之处。^③因而，受美国对外战略基调变化的影响，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重心也会相应调整。日本虽对美国实力和决心的耐久性保持越来越多的警惕，但也认识到，施行自主独立的地区及多边政策，至少在当前还不如与美国紧密相连来得更安全和划算，而且留在联盟框架内也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地区战略目标。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总体基调和模式，是坚持“同盟基轴”或至少不与

① 北岡伸一「インド太平洋構想 自由と法の支配が本質」、『読売新聞』2018年12月17日。

② 外務省「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2019年1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07642.pdf> [2020-01-25]。

③ 日本判断，美国是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支柱，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国家与美国有着巨额贸易顺差，因而“拉美入亚”在亚洲也会获得其他国家的赞同。

日美同盟产生正面冲突，日美同盟被一贯作为或宣示为战略基轴或支柱。当然，日本也曾摸索过独立发挥作用，构思带有战略自主色彩的地区战略，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的多边安全合作以及 90 年代中后期的 AMF 与“10+3”版东亚共同体倡议，但皆因遭到美国打压阻击而未能实现。汲取此中教训，加上面临中国崛起压力，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拉入美国（包括“日美+X”的小多边联合）的志向十分明显，例如其六个区域主义经验中的五个都有此迹象。某种意义上，日本在战略推进中不时强调“普遍价值”，也是与此相关的表里联动。

5.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针对中国的成分越来越重。其中的对华竞争色彩与牵制中国的指向日益明显，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在其战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虽然有复数变量促成了对地区战略的重新评估，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防范，是日本地区战略观转变的主要核心因素之一。中国是对日本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如何在地区战略中包含中国并塑造利己秩序，是日本面临的头号外交课题。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浓厚反映了这一倾向：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日本认为需要确保影响力并维持或重塑对已有利的地区秩序。中国因素或这种中日竞争因素被日本强烈意识到，是从 21 世纪初开始的，从彼时起，使中国影响力相对化的“扩大的构想”接连登台。日本的政策倾向影响了亚洲共同体及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至少像法德和解带来欧共体问世那样的局面在亚洲并未出现，国际观察及评论人士一般将此归结为两国相争带来的负面结果。不过，从 2017 年前后开始，日本在其区域主义战略实施中采取了较过去更复杂多维的对冲策略，中日也皆有意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携手步入合作新阶段，而中日能否构建新时代关系是区域共同体建设能否顺利前行的重要保证和关键要素。

6. 除了特殊时段，日本在绝大部分时段并不热心于推动构建“10+3”版东亚共同体构想。这与日本历史形成的身份定位有关，也与其对现实利益的考量有关。但是，对推动低版本的经济共同体及“扩大的东亚”一体化，日本则认为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主要原因是：第一，日本一度热心并主倡东亚合作（“10+3”）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巧合。历史上，日本一直在试图摆脱东亚大陆“地心引力”而不是被其“吞没”和覆盖。1997—2002 年是日本主倡“10+3”版东亚合作的高潮期，但这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百年不遇的历史偶然条件集成使然：东亚区域涌现加强合作的客观要求、美国对日战略放手及对华实施大接触战略、中国经济体量尚小、日本对保有地区主导权颇具自信，等等。但很明显，这种窗口期不可复制且不会永远存在。第二，日本“入亚”尤其主张

推行扩大的亚洲合作，则是历史必然趋势。中印与东盟等群体性崛起，域内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额的50%，日本经济振兴离不开亚洲，在战略上也需要“入亚”——对冲国际风险尤其“特朗普主义”变数，故而亚洲地缘依托不可或缺。

7. 日本推动区域主义战略的方式和姿态，也有从低到高、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从幕后策划到前台主导的过程。历史记忆、美国压制、中日竞争等，是重要的影响性因素。日本一贯比较重视在区域主义战略构建中与东盟和澳大利亚联合发挥作用，尊重东盟的“驾驶员地位”并注意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协调。日本或许认为，比起东北亚邻国，东南亚国家更容易接受或者至少不那么疑虑日本的亚洲领导地位，这种巧妙的影响力构建方式更容易为仍然怀疑日本意图的亚洲地区所接受。某种程度上，大部分时间的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中，东盟几乎成为与美、中同等重要的行为体。日本还注意赋予澳大利亚重要的角色扮演。东京鼓励堪培拉在APEC发轫初期发挥带头作用，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倡议在该地区不受欢迎。并且，从一开始，日本还特别重视联合澳大利亚共同培育对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承诺东盟将成为APEC的“核心”。^①更不用说，此后日本作为“地区代理”积极出面支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高调出台并推动日本版“印太”战略的实施。

（二）三个重要自变量的规范性影响^②

从以上分析可以观察到，美国及日美同盟、中国发展、区域认同障碍这三个重要因素即自变量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生成和走向具有宏观影响，其中前两个具有直接作用力，而区域认同障碍是一种间接的基础性影响因素。在冷战后（1991—2017年）明显的单极体系下，对日本来说，国际环境某种程度上首先就意味着美国霸权和日美同盟的影响作用，美国因素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形成和展开起着首要规范作用。中国的发展与崛起，起先对战略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越来越大，直至成为日本设计其战略的关键性考

^① 不过，应该看到，到了一定阶段和程度，中日发挥主导作用推动亚洲共同体前行，是无法避开的。日本顾忌近代历史的敏感性与美国的反应，中国顾虑古代史的记忆，但到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期的阶段，这些顾忌和顾虑基本已“脱敏”，中日需要也理应在推动亚洲共同体上发挥双火车头的作用。

^② 日本“国内及内政因素”对其区域主义战略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可分为三类：（1）日本国家战略及政策志向对其区域主义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安倍主义尤其“俯瞰地球仪外交”对“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规范作用。（2）日本政坛“卡拉ok式”民主轮换，往往导致日本外交政策支柱和地区战略出现相应的变动。例如，“新福田主义”、鸠山版“东亚共同体论”，在其倡导者卸任后即自行消失。目前尚不清楚“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府是否必然致力于安倍“印太”路线的推进。（3）国内决策主体及部门的多元化和复合化带来的影响。后冷战时代日本参与区域主义外交的政府部门日益多样化，不但有首相官邸、外务省、经产省，还有财务省、防卫省、农水省、环境省等。

虑因素。区域认同障碍即日本的身份与定位困境造成日本“入亚”难题，使其倾向于避免提及“敏感”的亚洲价值观和东亚共同体论，而往往低调地采取务实主义或机会主义手法：使自身区域活动的地理位置随着具体战略和当下目的（而非身份和地缘）而调整，这实际上给战略的策略性调整留出了想象余地和操作空间。

1. 变量之一：美国及日美同盟的规范作用

促进和制约日本区域主义行为的多重因素同时存在、相互碰撞。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盟因素同时具有诱导和阻碍日本参与地区合作进程的作用。

日美同盟赋予了日本在亚洲追求目标的更多自由，提供日本加入并促进区域机制的背书。日本与美国的密切关系缓解了亚洲对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忧，进而让日本在该地区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由于美国越来越有兴趣让日本承担更大的联盟负担并以“关键盟友”身份发挥安全作用，^① 这为日本军事力量的缓慢正常化并在区域主义中扮演更大角色提供了绝佳掩护。

不过，总体看，对日本版区域主义战略尤其合作导向的亚洲主义而言，同盟因素更多的是发挥制约作用。日本深陷对美双重依赖关系，这造成了非同寻常的军事和经济脆弱性——其区域战略建构中的一种系统性缺陷。日美同盟是日本 60 多年来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基轴，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结构是美国与该地区“深入接触”的基础，它对日本精英的相关性和重要性非同一般，日本在美国盟主的统治下受制于特殊的战略约束。日本即便做出了自卫队“走出去”的努力，但仍依赖美国海军在其进出口货物的航道上巡逻。而且，冷战后近 30 年里，日本实现了从美国向其他国家的出口多元化，但至今仍有 20% 左右的出口面向美国市场。因此，对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严重限制了日本建设一个内向型亚洲区域主义及共同体的志向。日美同盟始终使日本的该志向处于弱势，美国因素的强势存在使日本任何构建独自特色或亚洲联合的区域主义的冲动和图谋，最终都要符合甚至屈从于日美同盟的利益标准。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10+3”版的东亚合作无法建立稳固的共同体机制，甚至 ARF 也因此一直无法建立亚洲信任措施的原因。

对日本这样一个与美国有着异常紧密安全关系的国家来说，把自己深度卷入亚洲区域主义与一体化发展显然具有很大风险和难度。因此，日本时时处处注意让美国参与区域倡议——无论是三方还是更广泛的多边倡议，吸引美国对该地区保持强烈的持续兴趣，这似乎已成为一个恒常一致的主题。从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December 2017, p. 46.

冷战后至今，日本的对外战略重点仍然是扩大和管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① 东京和华盛顿几乎在不间断地加强双边同盟，并使其发展到一种广泛深入的防务合作。即使在新的多边主义时代，日本也一直持续敦促美国不要忘记在亚太（亚洲）区域发挥关键作用。这样做的动因在于，使多边主义不会被美国担心并视为替代同盟关系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向地区各方保证日本不会构成威胁的方式。日本保守政治集团的共识是：区域主义虽然有益，但需要被视为主要作用于强化双边同盟关系，没有美国参与的排他性东亚区域主义缺乏行稳致远的可能性。中日美之间日益变化的三边态势虽使日本战略构思复杂化，但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日本对联盟和区域主义关系的看法。这种看法构成了日本对其区域主义的基本态度和思路，即须服从于联盟管理而非遂行战略政策的根本转变。日本判断，至少中期内日本在推进亚洲区域主义过程中与美国脱钩的想法是幼稚和不现实的。因而，日本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亚洲区域主义和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做法的摇摆体和混合物。

2. 变量之二：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冲击效应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的政策一直以西方国际自由主义的假设为指导，即一个繁荣的中国将以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式行事。因此，日本按照全面对华接触战略以及亚太经合与东亚合作等区域主义范式，通过官方发展援助计划和其他形式的官方贸易及投资，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劝诱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中日关系渐趋震荡和紧张，开始让日本政治精英层对这一战略背后的假设产生怀疑。其后，随着时间推移，对于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感知日益影响日本对区域主义的考量。日本的亚洲主义者早在 90 年代初期就主张区域联合以对抗西方，实现“亚洲复兴”。但是，面对中国的崛起，这些亚洲主义者的声音逐渐变得微弱，甚至改变了调门。^② 中国的崛起、亚洲不确定的战略环境，使日本重新评估冷战后的亚洲区域政策。尤其进入 21 世纪后，多年紧张的中日关系明显抑制了日本政府以亚洲（东亚）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外交的自信与热情。日本认定，通过支持区域机构和其他多边机制的发展增加其在亚洲的影响力策略之所以时常遭到挫折，皆因中国的抵制和反对。中日关系中日渐出现竞争和对抗的要素，权力现实主

^① Yun Zhang, “Multilateral Means for Bilateral Ends: Japan, Regionalism, and China – Japan – US Trilateral Dynamism”,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7, January 2014, p. 6.

^② 参见: Yoichi Funabashi, “The Asianization of Asia”,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3; 船橋洋一『地経学とはなにか』、文春新書、2020 年。

义的假设和逻辑开始削弱日本遵循自由主义框架对东亚区域合作前景的看法。

从理论角度看,这符合现实主义霸权论和均势论的解释范畴。中日作为地区大国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从区域层次看,崛起国要逐步获得区域体系的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地区秩序产生冲击;区域内其他行为体尤其大国对自己安全和利益受到震动不会毫无感受,自然会关注崛起国追求的区域秩序,而对未来前景(秩序)的不同看法及悲观预期很容易引发其对崛起国的制衡行为。日本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区域影响力保持警惕,对待东亚区域主义的方式,也变为主要使用硬平衡和软平衡与中国进行主导权争夺。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以中日经济总量逆转为契机,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中平衡和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成分和比重日益增大。中国在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日本政府越来越多地寻求一种以加强与地区国家关系为核心的对华均势方式来推动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①

即使在中日 GDP 对比逆转后,至少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日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为背景,日本认为自己有资本和能力在地区范围内对华进行竞争和抗衡。中国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亚第一大经济体,但冷战后至今尚未取得毫无争议的东亚区域主导权和中心地位。日本应当是认为,在崛起国的区域体系内存在一个或多个竞争者的情况下,崛起国中国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很轻松取得地区主导地位,且仍有被其他行为体联合或单一压制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日本作为域内主要行为体,联合其他将崛起国视为利益威胁的国家,并非没有条件和资本对华开展竞争和角逐。^② 日本认为,通过贸易(如 TPP)等平衡中国具有很大地缘政治意义,这种动作可以提醒中国,印太地区正形成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将面对一个强大的多边国家集团;而日本自己在亚洲内部贸易方面的对华竞争与平衡非常重要,日本联合其他域内相关方的做法将使亚洲区域主义发展不被中国单方面主导并使己免于处在不利位置。

3. 变量之三: 亚洲认同困境与日本身份犹疑^③

从前述分析可见,日本在身份及定位上具有“宿命”性的游移与困境,

^① 当然,中国也担心日本对华采取的区域对冲策略,会适时采取一些应对和反制举措。这也造成双方在地区合作及机制构建中的困境。例如,在贸易领域,中日竞争造成了制度建设受损的局面。

^② 王震、高程:《崛起国对外策略中的大国与周边》,《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1 期,第 91—98 页。

^③ 此为基础性变量,其发挥的是长线作用,在分析短线问题上很难成为显性的可操作因素。并且,对这个主观性因素能否以及如何化为自变量,学界亦有争论。

不仅对自己的地缘属性，对世界地缘板块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这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制定其实是个历史难题，其一直作为“执拗低音”制约并规范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设计与制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10+3”以及“10+6”合作机制成功构建，东亚概念出现并被广泛热炒，这些因素有助于促进亚洲国家形成东亚身份，日本也曾一度把区域主义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重新对东亚区域产生兴趣的知识分子再次活跃，例如小仓和夫于1999年曾提出亚洲必须以统一的方式行动……日本必须承担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大部分领导责任；一个团结的亚洲和西欧有必要准备遏制美国。^①同时，在整个冷战后的时代，日本没有放弃参加该区域的各种多边论坛，这些机制为日本的一些目标服务，例如为东京向该区域传达观点提供重要平台。

然而，尽管正在崛起的“亚洲主义”在日本一直是个话题，但在整个后冷战时代，东京对亚洲区域主义的看法仍是复杂和有分歧的。^②日本人总在竭力避免却又不自觉地以相互排斥的方式看待自己与东西方的关系，当代国际大变局下其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更不习惯的东西方战略现实。日本在如何拥抱与选择东西方的政策之间摇摆不定，特别是在东西方存在战略冲突和结构矛盾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相互排斥及难以兼容，无论是包容性结构还是排他性结构。冷战后的民调显示，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有高有低，但总体处于高位，与此同时，各种调查却显示出其对亚洲的亲合力并没有显著的增加。^③日本不像亚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其没有对一套特定的亚洲价值观及身份的拥护与坚守，也几乎很少表示对一个美澳缺席的东亚共同体的直言不讳的支持。即便如新加坡这样的东西融合型国家，其领导人也试图强化一种亚洲价值观的地区意识形态，以避免西方化的同质化和不同民族传统的分裂，但日本却缺少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政策行为。^④

亚洲的集体认同和区域主义指的是在地方和人民间建立新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区域主义落地所需的既是空间性的，又是政治性的条件。可以把一个区域定义为一个在各种不同方面明显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团或植根

^① Kazuo Ogura, “A Call for a New Concept of Asia”, *Japan Echo*, No. 3, Autumn 1993, pp. 37-44.

^② Akiko Fukushima, “Multilateralism Recalibrated: Japan’s Engagement in Institution Building”, *ASIA Staff*, April 2016, <https://www.cogitasia.com/multilateralism-recalibrated-japans-engagement-in-institution-building/> [2020-01-13].

^③ 至少有日本内閣府、言论NPO以及美国皮尤公司等进行的相关民意及輿情调查表明了这一情况。

^④ 以上根据笔者2017年夏秋在哈佛大学对傅高义(Ezra Vogel)、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等学者的访谈。

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和认知结构，它主要取决于各种利益和议程。^① 东亚（亚洲）区域不是自然、客观和本体论上给定的空间，它从未形成一个参与争夺全球优势地位甚至霸权的统一身份和地缘集团。“10+3”进程所支撑的“东亚”轻易受挫，就是明证。身份归属和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区域主义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标志及载体，但日本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避免提及亚洲价值观和东亚共同体。对其来说，亚太或环太平洋地区是更便利和适宜的区域概念，是一个可包容东西与南北的制度化话语。日本不时犹豫迟疑地在亚洲采取行动，这可能因其只是希望在政治上获得更高地位，并非真心推动敏感复杂的亚洲主义的复兴与发展。包括处理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日本开展区域活动的地理位置往往随具体战略和当下目的（而非身份和地缘）而改变。

虽然到 2017 年前后，日本很难或总是不愿变革其身份站位并真正回归亚洲，但在近年国际大变局真正显露端倪后，其也不乏灵活而务实地从策略上调节站位与身段的意识和能力。亨廷顿曾反复提及，随着国际格局与地缘形势以及自身经济盛衰、军事强弱的变化，日本快速自如地进行身份更新、认同切换和文化再造的历史现象，并且他还深信日本文明的摇摆性、特异性和非西方属性，指出如果中国足够强大，日本更愿意采取搭车而非均势、顺应而非制衡、“入亚”而非“盟美”的战略行为。^②

（三）变量因果机制的拓展分析与趋向推导

没有一个单一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能够充分解释日本的区域主义战略。相比而言，新现实主义分析框架，特别是从结构因素来梳理因果关系即体系结构塑造和推动国家行为的方法^③，有助于探析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演变的核心要素和基本规律。当然，结构现实主义在解释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演变及规律上也有其缺陷和不足，这种场合就需注意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重视的“中介变量”作用，尤其是在日本政坛出现强势首相“超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例如，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主导日本政坛的安倍政府，面对国际大变局，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调整其对外战略，就不是结构现实主义能够完全包括和解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p. 357.

^②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02—110、249—266 页。亨廷顿指出：日本“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文明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参见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01 页。

^③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p. 915.

释的。不过，总的来看，这也是在中日国力对比出现重要动态、日美同盟出现“状况”的条件下的一种作为，某种意义上也是顺势而为。虽然有早为、晚为或作为程度的问题，作为中介变量的“安倍政治”最主要的还是顺势而为，没有发生从根本上推翻结构要素即自变量的现象。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的传统研究手法主要是证实压力传导偏离了体系压力，但证明“没有偏离”也在其范式应用范围之内，上述分析显然属于没有偏离的案例。^① 所以，此处体系结构仍是最重要的规范因素即最大的自变量。

在单极体系下，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架构和走向，取决于日美同盟状态、中日实力对比及互动关系。如果中美关系全面破裂、完全脱钩，日本没有选择余地则只能在战略上紧随美国，但中美斗而不破、竞合并存，即冷战后 20 多年处于“好不到哪儿去、坏不到哪儿去”的界内时，中美关系就不是一种发挥结构性作用的自变量，而是一种重要的干预性变量角色。^② 同时，在日本看来，美国霸权或日美同盟起到了类似体系结构的作用，在单极体系下两者基本可被视为合二为一的自变量。结合以上进程追踪及特征总结，可以发现，冷战后至 2017 年前后即典型单极体系（美国霸权治世）的阶段，日本区域主义战略调整有如下三点规律或曰三种模式：（1）冷战结束后到 21 世纪初，日本采取的是经济中心、合作导向的区域主义战略。这明显是结构因素的产物，即受到日美同盟状况与中日国力对比的规范性影响。当日本认为日美同盟牢固（+中美关系总体良好）、中日经济总量不在一个数量级即“日强中弱”（日美对中国更显优势）时，日本“联美容亚（中）”，愿意采取立足亚洲、包容中国、推动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区域主义战略，例如“亚太经合”“10+3”版东亚合作等。（2）从 21 世纪初小泉政府开始（大约十年，即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期），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呈现政经合流、政略上扬的特性。此期，日美同盟良好或总体稳固（+中美关系总体尚可），中日实力对比的状况是从日本处于较大优势逐渐向优势丧失以及错肩期转移，日本对华防范一面上升并“联美防华”，其区域主义战略的属性与色彩随之改变——政治安全要素开始抬升，逐渐摆脱单一型“经济合作战略”而向“区域战略”演变。这体现在“10+6”版“扩大的东亚”合作、“扩大的亚洲”即“两洋交汇”“自由与繁

^① 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外交评论》2009 年第 4 期，第 135—137 页。

^② 此处，“中美关系”不等于美国对华政策，冷战后较长时期内，中美关系虽时有震荡但总体稳定。

荣之弧”等构想的出台上。(3) 从 2012 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到 2017 年特朗普政府诞生前后,日本采取的是政略优先、秩序拼争的区域主义战略。此期,日美同盟较为稳固(+中美关系时不时震荡)、中日实力对比处于 2010 年逆转后逐步拉开差距(日美对中国仍优势明显)时期,日本“联美返亚”、重视地缘竞争与对华防遏,其区域主义战略演变为一种权力现实主义的典型地缘政治战略,其间的政治安全要素明显抬升,这表现在日本版“亚太再平衡”以及“印太”战略的推动和倡导上。

因而,根据以上三阶段梳理所得的规律,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2018 年前后开始)可能的状况进行拓展分析,首先可以发现:(1) 美国(或日美同盟)对华具有相对优势、但中国对日又具有较大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而言,两大关键自变量仍然是(日本感知的)日美同盟牢固度、中日国力差距,而非战略竞争趋势明显、不时紧张震荡的中美关系。^① 同时满足这两大结构因素条件(自变量),即当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感到前所未有不安、中日国力差距明显拉大至 2019 年的近三倍时,日本的不安与紧张剧增,其区域主义战略至少从理论上应当有开始大幅策略性调整的可能性。^② (2) 在此之上,从 2018 年前后开始,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化,单极体系与美国霸权作为自变量合二为一的格局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裂隙。在日本看来,美国治世也很难再完全代表体系结构,霸权稳定的理想局面已不再是日本对外战略决策的先决条件。并且,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但并没有到摊牌地步,日本始终担心双方之间“越顶日本”的战略交易骤然降临。

以上两点因果逻辑的推导结论是,日本战略自主性与实用主义将发挥作用,有较大可能推进其区域主义战略走向“回归亚洲”“联美入亚”、政经并重、平衡(对冲)中美的路径,同时对华采取非关键的技术性顺从和经济“搭便车”现象。^③ 实际上,这已典型地体现在其 2018 年将“印太战略”改

^① 当然,前提是中美没有处在战略摊牌和完全脱钩的关系状态。中美关系虽有紧张不时加剧趋势,但安倍的作为并没有超出美国的容忍范围,其“战略自主”并非“战略独立”。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逐渐部分脱钩,会使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处境微妙且日渐困窘,但尚不致其颠覆性地改变对华政策。

^②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 GDP 总量达 14.4 万亿美元,日本 GDP 总量约为 5.21 万亿美元,约为中国 GDP 的 36%。

^③ 如果中美形成完全战略均势或中国具有对美的相对国力优势,中日国力差距达到数倍以上,日本有可能大幅调整战略。但很明显,这一局面目前还很难发生。

称为“印太构想”、提倡构建“新时代”日中协调关系的动向上。^①其原因就是，进入2018年前后，除了上述两大自变量的重要变化，“体系含义”与区域局势同时也在发生明显改变，世界加速迈入公认的大变局和秩序动荡时代。

三、大变局下“日本回归”与区域合作契机

2018年前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面临着重要的策略调整和重组。如上所述，除了日美同盟与中日力量对比这两大重要自变量发生很大变化外，被作为先验条件的单极国际体系这一结构因素也发生了微妙的震动，并且地区合作进程也发生了若干积极向好的改观和前行，进而日本的身份归属感与共同体意识也随着这些变化而潜移默化地发生位移。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正经历一些重要的调整，虽然这仅限于一种策略性的变动，但日本开始更多关注和强调地区经济的亚洲内部融合与一体化以及自主多边广域构想，这多少给亚洲区域融合与共同体构建带来了契机和助力。

迄今，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尚未发生动摇，美国仍是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并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但某种深刻变动的前兆，尤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格局动摇，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设计的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剧烈。^②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和证明。

第一，单极体系及国际秩序的震动，促进日本“入亚”。世界体系与国际格局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影响，可导致一种相对开放或收缩的区域主义。日本的系统性脆弱源自对美国霸权即单极体系以及全球市场与资源的依赖，这也限制了日本面向一个内向型亚洲集团的志向与努力。在贸易、援助、投资和技术转让等许多方面，相比处于一体化程度较高区域的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日本同全球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广泛。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环境变化，包括当下热议中的世界走向两极、多极抑或无极的各种趋向，

^① 如前所述，这种变化态势和规律，是在日美同盟与中国国力这两大自变量发生重要变化之际或前后一段时间显现的。因而，如果特朗普实现总统连任并保持其政策连续性，中国维持良好发展势头并国力持续增进，那么可以预测到2023—2025年前后，日本在是否加入亚投行、推进完成中日韩FTA等问题上，立场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可能。

^② 細谷雄一「リベラルな国際秩序の終わり?」、『アスライオン』2018年5月号、12—13頁。众多国际知名学者，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于2019年崩溃，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多极时代。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7—50。

使得此前以单极体系即美国霸权治世为前提展开的日本区域主义战略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题。这就使得对日本来说等同于美国霸权的体系结构,开始作为独立的自变量因素隐约发挥作用。在外交、安全和经济领域拥有巨大权力的美国,作为体系主导国在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其“退约退群”行为造成了国际制度失效受限的严重后果,^①成为制约国际制度与规则发挥作用的重大负面因素。特朗普一直倡导“美国优先”政策并迅速降低和淡化维护世界秩序的意愿与角色,世界体系及秩序经历了冷战后近 30 年里最大的震动,世界秩序的维护与稳定愈显困难。欧盟、中国、日本等国际社会的其他主要参与者并不能真正补充美国所承担的角色,而数量有限的国家集团,比如日本非常看重并依赖的七国集团(G7)内部也很难达成共识,更难形成一份联合声明。国际制度与治理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国际社会已无法制定有效的共有规则,更糟糕的是即使是既定规则也经常被践踏。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体系结构与格局秩序将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与不透明。一句话,日本所仰仗的全球主义以及国际体系出了大问题,这给日本的宏观对外战略设计带来了很大影响。

第二,全球主义的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的全球化,推动日本“回归”亚洲。亚洲“区域建设”既构成于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区域化”所带来的贸易和生产的全球化和网络化进程,也需要被正式的国家主导的行动例如“区域主义”进程所推动。国际形势与世界战略态势正发生戏剧性转变,全球化进程面临重大新局面,此时特朗普政府遂行“美国第一”,挑战的不只是中国,也牵动了其主要盟友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的神经。美国的“退群”行为及其挑动的贸易争端,和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日本造成相当大的困惑和麻烦,也给日本对地区主义的认知带来了调整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大变局形势下,超级区域主义是日本(其实也是亚太各国)应对特朗普保护主义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则是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尤其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相反,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与中国共同维护世界贸易秩序。中日立场相同或相近的是,都认为亚洲不能容忍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蔓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应对挑战,就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保持合作,就 WTO 改革举行协商(虽然立场不

^① Jeff D. Colgan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Liberal Order is Rigged, Fix It Now or Watch It Wither”,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3, 2017, pp. 36-44.

尽相同)。东京在与亚洲关系中开始重点强调区域主义与互联互通这两个宏观经济工具，经贸目标将继续在日本对地区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客观上给亚洲区域主义再次发力和整合带来了经济合作契机和起跳板。

体系结构的新动向之下，“日本回归”与区域融合及一体化新态势、中日“新时代”关系构建及区域协调、日美“同盟疑虑”与日本“入亚”对冲等，也促使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加速调整转型，此种态势给区域共同体建设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一）日本“回归”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贸易摩擦全面爆发后，亨廷顿就甚为感慨地指出，力量对比变化与文化差异“促使亚洲社会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相互支持”，“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它们与其他东亚国家要比与美国有更多的共同点”。^①有趣的是，90年代初期前后“美国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这样同时‘恶化’”的场景，^②在特朗普时代的中美日关系格局上发生了新时代的重现。

不管从政治安全、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的角度，今天亚洲国家之间的壁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地下降。东亚经济的持续增长、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将有助于缓解现有的一些紧张局势。亚洲经济社会已经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大多数涉及亚洲的交易都可以在亚洲资本市场内部融资，亚洲国家已经建立了大规模货币互换协议，此外还有实用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合作等。对日本来说，其40%的对外贸易目前是与亚洲发生的，许多推动日本走向广域亚洲合作的因素仍然存在，而当前促推日本建立亚洲共同体信心的两个平行基石可能是“共同利益”与“共同体意识”，这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区域融合与一体化动向上。

1. 区域一体化与自贸协议提速中的亚洲融合

日本完成CPTPP、日欧EPA缔约，由此提振了推进一种高质量地区自贸协议谈判的信心和能力，于是其重点又回到亚洲，开始着力推动达成RCEP。^③对此动向，西方观察家以至于担心：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再次试图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在东亚建立一种“共荣圈”，且这次是真实的，具有开放

^①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52—254页。亨廷顿当时就告诫：“美国如果任其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变得更紧张，显然与国家利益不利。”参见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49页。

^② 同上书，第249页。

^③ 蔡亮：《安倍政府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战略意图剖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第94页。

和公平的贸易规则。^① 日本区域（广域）自由贸易构想的顺序是：TPP（CPTPP）、RCEP、中日韩 FTA，从大到小、从外到内。当然，RCEP 也带有浓厚的泛亚或印太视域，因为日本一再强调必须包括印度在内。日本自 2018 年前后起开始加快谈判进程，但所持底线是印度必须加入，“不考虑没有印度的 RCEP”，实际就等于说东亚合作的版本必须落在“10+6”的“大东亚”方案上。^②

全球化退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强权霸凌行径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的宏观生态环境恶化、体制面临危机，国际治理面临严峻挑战。这些问题的发展正在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和投资流动，扰乱供应链，并对支撑跨境贸易的信心和可预见性造成长期损害。对于由贸易发展起来、严重依赖跨境贸易与投资的日本经济而言，这些事态发展至关重要且非常严峻，需要对此做出自己的回应，推动制定多边协调和区域合作的应对措施。

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在内，为应对当前困境，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越来越倚重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中日两国都是现行国际经贸秩序的受益者，都希望和维护关乎切身利益的国际自贸及多边机制中发挥更大引领作用。日本与中国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具有较高共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各国，为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带来的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和政策不确定性，采取的建设性回应举措之一就是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将其经济和外交精力转向亚洲内部以及各大区域之间的共同伙伴网。日本现在认为，RCEP 对亚洲应对新形势和新危机至关重要。RCEP 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区新兴大国，而从一体化路径的选择来看，RCEP 本就是中日所持两种东亚主义路径的折中。^③ 日本尽管最初未能及时认识到 RCEP 的战略意义，但现在已将尽早缔结 RCEP 提升为构建多极世界新秩序、拥抱亚洲合作的基础。RCEP 的发展总体上得到东亚主要大国的支持，当然也有助于塑造亚洲共同体的集体身份认知。^④

RCEP 的“亚洲性”表明，它可能成为未来泛亚经济集团的一个原型，将进一步促进亚洲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美国的缺席使 CPTPP 规模有限，中日

① Michael Hirsh, “How Japan Became the Adult at the Trade Table”, April 10,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10/how-japan-became-the-adult-at-the-trade-table/>[2020-03-10].

② 「梶山経産相インド含めたRCEP 妥結目指す」、『読売新聞』2019 年 11 月 5 日。

③ 叶成城：《能力分配、制度共融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当代亚太》2020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④ 根据笔者 2019 年 10 月 23 日对日本外务省国际贸易谈判大使暨政府代表井出敬二的访谈。

印澳加入的 RCEP 有望成为下一阶段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模板。RCEP 相对较低的目标和更大的灵活性也有助于其扩张做大。因此，若 RCEP 得以成功实施，将有机会超越 CPTPP，成为推动亚太自贸区发展的首要工具。中国目前似乎还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动机需要立即加入大打折扣的 CPTPP/TPP。美国倒是可能加入 CPTPP/TPP，但除非美国打破当前政策轨迹并恢复其作为一个可信、善治的国家形象，遵守基于规则而非基于权力或主权的贸易秩序，否则特朗普政府狭隘且表现欠佳的贸易政策仍然不会减少日本的“入亚”热情。^① 并且，随着 RCEP 国家的经济变得更加成熟，其将按照自己的步伐逐步提高对地区自贸标准的承诺。CPTPP 和 RCEP 可通过竞争吸引新成员，也可相互接轨逐渐迈向全面的亚太自贸区。至少，亚洲国家可能在 CPTPP 甚至 RCEP 中开辟更多区域贸易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商品的市场将会减少，能够与美国制造商竞争的亚洲供应链将会更加强大。^② RCEP 谈判于 2019 年 11 月宣布结束，并有望于 2020 年签署。^③ 2019 年 12 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及经贸部长会议召开，三国重申将积极推动 2020 年如期签署 RCEP。如果 RCEP 能够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推进自由贸易，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亚洲主义意义的巨型贸易集团。这样一个不包括西方经济大国的集团，可使该地区在经济乃至战略上更多地与美国疏离，将对全球贸易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并客观上巩固以中日或东亚为中心的地区经济架构与体系。

2. “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对接——亚洲基础设施联通构建

亚洲对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巨大需求，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引人注目。对此，日本经济界及政界开始要求更多地关注对东亚的政策。日本正与印度合作，根据“亚非增长走廊”的建议，发展横跨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海上互联互通。根据《2018 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东京战略》和“高质量基础设施扩展伙伴关系”，日本也在推动相关东盟国家的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过去的几十年，日本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国家提供双边贷款，为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主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日本商企还经常在海外赢得大

^① Xianbai Ji and Pradumna B. Rana, “A Deal that Does Not Di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the (CP) TPP”, *Pacific Focus*, Vol. 34, No. 2, August 2019, p. 234.

^② Keith Johnson, “While Trump Builds Tariff Walls, Asia Bets on Free Trade”, November 1,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1/01/trump-tariffs-free-trade-rcep-asean-india-china-bangkok/> [2020-01-22].

^③ 尽管 RCEP 尚未签署协定，但有理由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预期。

型基建项目的合同。日本对基建助力经济的关注也源于其自身发展经验，而基础设施将使其能促进与受援国的贸易活动并从受援国顺利取得能源与资源。

日本“印太”战略的调整，为中日合作创造了契机和空间。进入 2018 年后，安倍政府开始打造“印太”战略的升级版，在表述印太概念时开始顾及中国感受，当年 11 月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意即“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谋略，而是相关国家共有的认知和愿景，同时对外强调开放、包容、合作等要素以及经贸合作、与“一带一路”对接等意向。^① 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大幅改善、日美经济摩擦和矛盾上升，日本进一步淡化“印太”中的对华色彩，慎重避开“印太”战略与日美澳印“四方机制”的关联，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国善意地传达“印太”理念的概要，介绍称“该战略（构想）目的在于与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各国协作，实现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将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② 安倍继 2017 年 5 月公开向“一带一路”倡议示好后，多次声言“印太”战略可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中日双方可探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2019 年，东盟发布“印太展望”后，日本更注意其“印太”构想的公共产品供给属性和地区协作性。

中日也因此也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上取得重要进展，成果日趋坐实落地，经贸共赢与多赢、深化地区合作某种程度上成为两国基本共识。中日双方同意探讨“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就基础设施项目开展合作。^③ 当前，两国政府正支持各自商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包括围绕亚欧互联互通、摸索在东南亚合作、北极圈俄油气联运等项目开展合作。日本的策略调整为“变相”参与，而不是正面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18 年 5 月，中日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双方“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式起步。6 月，日本政府修订《基础设施出口战略》，首次写入“推动日中企业在第三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相关内

① 河合正弘「『一带一路』構想と『インド太平洋』構想」、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World Economy Report』2019 年第 2 卷、https://www2.jiia.or.jp/RESR/column_page.php?id=348#pagetop [2020-02-01]。

② 参见：「首相中国に配慮？ 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を『構想』と表現」、『毎日新聞』2019 年 11 月 19 日；大庭三枝「日本の『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構想」、『国際安全保障』2018 年 12 月号、26—29 頁。

③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强调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外交部网，2018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t1558182.shtml> [2019-12-28]。

容，提出两国应在双边高层经济对话基础上设置跨部门委员会负责协调相关事务。10月，安倍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50多项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协议，总价值超过180亿美元。2018年至2019年，第一届与第二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分别举行，成为双方进一步深化相关合作的契机。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合作方式向第三方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的联合贷款。近来，日本对亚投行（AIIB）态度加速发生微妙变化，似在外围铺垫、低调融入，例如日方高级别人士已于2019年7月悄然加入亚投行“国际咨询委员会”，其他还有金融、项目运营人才也相继入职。^①

中日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对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两国在广阔的地区及第三方市场，不仅有竞争，而且更可以有共赢，这将开启区域合作的新模式和新前景。亚洲几乎所有商机存在之处都有中日的参与，例如，在柬埔寨，日本正进行各种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帮助建设西哈努克维尔的港口，而那里也是中国大量投资的地方；日本对斯里兰卡及孟加拉国的中方活动有很大担忧，但其实日本也在帮助修建科伦坡和达卡的港口。中日在这些地方和领域完全可以有序竞争、有效合作，而不是必然要落入零和游戏。并且，在多边发展合作方面，中国表现出了灵活务实、从善如流的意愿，这超过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现今所展现的国际领导能力。例如，一般认为，中国吸收和借鉴了日本提出的有益建议和做法，对最初的亚投行设计进行了充实完善。亚投行、亚开行分别由中国和日本领导，两行都对发展和基础设施融资有着共同愿景，这使得双方很快形成某种合作关系。截至2019年，亚投行已与亚开行及其他12家开发银行和基金签署了谅解备忘录。2030年前，亚洲需要2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两行未来的合作中，中日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两行也有机会在不进行恶性竞争的情况下扩大地区项目业务。

3. “新三国”时代与东北亚一体化提速

在亚洲区域一体化及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东北亚由于历史原因尤其中日关系矛盾，一直居落后地位。近年，中日关系大幅改善向好，为东北亚合作和一体化建设的重启与升温注入强大动能：2018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两年半得以恢复；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重大成果，对未来三边合作达成政治共识，指明了前瞻性规划与战略性方向。中日韩由此

^① 吉岡桂子「二つの隣国 日本人を引き寄せる力の差」、『朝日新聞』2019年10月30日。

被称为进入了共筑和平与繁荣的“新三国时代”。面对全面、深刻、复杂变化的当今内外环境，三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坚持视对方发展为机遇，不断拓展共同利益。立足东亚、聚焦亚太，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打造符合地区国家需要的东亚合作架构”。^①

“新三国关系”可以也应当引领实现新亚洲世纪，开创地区经济发展新局面。中日韩分列全球第二、第三和第 11 大经济体，三国相加占东亚（“10+3”）经济总量的 87.5%（2018 年）。东亚区域合作一直以东盟为中心展开，被称为“小马拉大车”，中日韩加强合作，至少可形成东亚合作及治理的双轮驱动效应。首先，将有力推动亚洲全面高质量自贸体制构建。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关于东亚合作，三国一致同意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 RCEP 早日签署；在此基础上加速中日韩 FTA 谈判，早日建成贸易总额超过 7200 亿美元的高标准自贸区。其次，有助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文件也提出了促进包括交通、物流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②“中日韩+X”成为三国新时代的合作亮点。中日韩正以创新方式引领对外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在成为三国合作新模式。2018 年 8 月，中日韩外长会议发布了《“中日韩+X”合作概念文件》，提出要“凝聚三国共识，提升合作水平；发挥互补优势，推动区域内外共同与可持续发展”。三国领导人会议还通过了第一批“中日韩+X”合作早期收获项目，涉及中日韩与地区国家的多领域务实合作。再次，地区安全治理合作将迈出重要步伐。面对东北亚局势及朝核问题，三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正凝聚共识，加强协调配合，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还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十年三边在此议题上的总体规划和主导方向，即维护持久和平安全，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发展长期友好关系，共同推动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此外，三国还同意在反恐、网络安全、能源资源与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广泛合作。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深了三国对强化区域合作和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日韩尤其日本率先对中国“抗疫”提供宝贵支持和帮助，其中令人关注的亮点是中日间高度良性互动，日本各界热情向中国提供大量

^① 《李克强与韩国总统、日本首相共同会见记者》，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gov.cn/premier/2019-12/24/content_5463657.htm [2019-12-30]。

^②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12/24/content_5463712.htm [2020-01-17]。

防疫物资，并附以古诗词，中国外交部专门对此表达赞赏和谢意，王毅外长表示“疫情面前，中日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①其后，日韩疫情开始告急，中国同样没有缺席邻国的抗疫努力，三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对相互风雨同舟之举高度关注和赞赏，合作与友好气氛进一步生成，彼此好感度皆有上升。中日韩相互驰援、守望相助，“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了疫情下三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写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疫情面前更是命运共同体。^②疫情无国界，构成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威胁，三国用行动诠释了对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当前形势下，三国正完善并强化卫生防疫沟通协调应急机制，密切疫情防控、医疗救治、药物疫苗研发等领域合作，并积极探索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三国还加强沟通协调，开展联防联控，切实维护好本地区公共卫生安全，同时确保三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尽可能降低疫情对三国务实合作的影响。总之，三国卫生健康领域合作范围广泛、方兴未艾，对于维护本地区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大意义，这有助于三国凝聚共识，将医疗卫生、应急管理、社会治理纳入新关系合作范畴，为进一步共同创造东北亚新时代提供了机会之窗。

（二）中日“新时代”关系助力区域主义前行

亚洲区域主义和共同体构建的挫折经验，就是缺少中日双火车头的牵引领带。对比全球所有区域机制可知，无论是在贸易、金融、安全还是发展方面，东亚地区主义都已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网络。但是，只要就东亚共同规则的协议仍未达成，这种网络化合作就不会带来更制度化和更深层次的区域主义。在冷战后的30年里，亚洲在区域主义方面的许多项目没有能够实现，包括日本一度热心宣示的“10+3”版东亚共同体目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日关系恶化造成的障碍。然而，从2017年前后起，事态有了较大的改变和好转，中日有望采取进一步的合作姿态和措施，推动构建新时代负责任大国及地区治理合作新关系。中日是亚洲区域主义的中心力量，两国的深度经济和政治参与对于区域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安倍政府谋求“战略自主”，导致明显的战略风格变化及对华政策

^① 《王毅与日韩外长通电话 有这些抗疫合作的关键信息》，人民网，2020年2月2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227/c1002-31607657.html> [2020-04-08]。

^② 《2020年3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2020年3月20日，http://search.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58730.shtml [2020-04-11]。

调整，两国深化区域主义合作具备前所未有的利好条件。^① 进入 2017 年前后，日本对国际环境和潮流的变化产生巨大的焦虑和不安，进而据此重新调整国家战略、显露加速追求战略自主的倾向。2019 年秋冬，中日分别达成对美贸易协议，但相关难题、悬念仍在。中日皆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这一难题，需拓展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加强大国合作、进行缓压和对冲。2020 年，如特朗普实现总统连任并不改“初衷”，日本将进一步体认形势深刻变化，加深战略性不安，进而加大政策自主与对冲，包括谋求稳定并发展中日关系。日本筹谋抓住有利时机占据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有利位置，放大自身角色，平衡三角架构，借势谋取大国地位，而以推动亚洲地区一体化为战略依托，主动调整对华关系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中日关系近年总体呈现加速回暖与持续改善的良好势头，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形势中令人瞩目的亮点。目前，中日关系亦成为双方在应对复杂国际变局中的良性外交资产。在全球格局震荡、秩序动摇、大国博弈进入深水区之际，中日双方皆有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刚性需求，不至于轻易放弃这份优等资源。尤其是双方领导人互访、经贸合作深化拓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危机管控机制落地，为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进一步注入动能和内涵，也标志着两国关系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的紧张状态出现了明显转变。日本 2019 年版《外交蓝皮书》认为，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安倍在 2019 年底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20 年初国会施政演讲中均表示，将主要通过领导人外交以及多领域深化拓展交流，构建“新时代成熟的日中关系”。2018 年 10 月，安倍访华前后多次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三条意见，即中日关系要“从竞争到协调”“从威胁到合作伙伴”以及“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系”，主张以此“将中日关系引向新时代”。^② 实际上，两国领导人在 2018—2019 年的多次会晤中一致认为：两国关系已重回正轨并持续改善向好，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双方共同利益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③ 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同开辟两国关系新未来，推

^① 安倍超长期执政意味着他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可以较为自由地推动“官邸外交”，强势地保持政策连续性，并可能更加主动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② 外務省「安倍総理の訪中（全体概要）」、2018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l/cn/page4_004452.html [2018-12-19]。日方往往将此三条意见表述为“三原则”。

^③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社大阪 2019 年 6 月 27 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6/27/c_1124681266.htm [2019-12-05]。

动中日关系再上新台阶。中日关系的缓解与改善，不仅将减少摩擦冲突的危险，还使促进经济合作更为容易，有利于两国及整个地区合作的发展与升级。

中日关系在持续改善的进程中至少显示出如下几点新意：

1. 日本对华战略认知与策略出现积极变化，中日有望部分缓解政治对立与战略互疑。与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不同，安倍以宣示协调和合作为标志的宏观策略调整大幅缓和了对华关系，在对美和对华外交也就是对其而言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上，进行了一些平衡和折中的处理。国际大变局下一系列共同利益和复杂挑战，限制了日本的权力现实主义倾向，导致日本对华寻求和解协调而非对抗摩擦。日本在固守日美同盟的同时，也较从前更用心地加强了对华协调，这与特朗普政府全力压制中国并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2. 两国经济合作正继续深化发展、提质升级，重新点燃了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正向共赢贸易关系，释放经济合作的潜力是改善关系的重要动力。从中日面临的经济形势来看，两国加强经贸合作都有其必要性。2019年下半年尤其消费税增税以来，日本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下行压力加大，2020年出现负增长已属无疑。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日本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市场提供强大助力，对华经济依赖性会不减反增。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人口老龄化，在高科技、现代服务业和社会治理方面，对日合作也有广阔前景和重大利好。2018年以来的中日双边高层会谈，进一步指出了两国经济合作的着力方向和新增长点，例如就加强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中日在这些业态的互补互促性强、合作空间大，相互投资意愿日渐提升。中日就此合作潜力巨大，商机无限。两国同意续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启动、在2013年紧张局势期间到期的本币互换协议，该协议的最高限额约为300亿美元，是之前协议的十倍。^①

3. 建设性安全关系构建有助于补齐中日关系的短板。安全领域最重要的动向是，2018年6月，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启动运行，该机制旨在防止两国舰机在相关海空领域发生意外冲突。该机制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日本自卫队之间直接沟通的规则和热线。同时，双方还同意就海上搜救行动开展

^①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强调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外交部网，2018年5月10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t1558182.shtml> [2018-12-20]。

合作，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互访，以及防务部门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落地，有助于改善两国防务等部门之间的沟通，避免可能导致冲突的误解。而且，管控海空争端为中日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创造了更多空间。当今国际大变局时代，为建立区域安全与命运共同体的政策议程提供了最有希望的办法。各国可以在不牺牲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来加强区域和人类安全保护，供给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跨国犯罪到经济金融、从能源资源和环境安全到国际公共安全及传染病疫情挑战等，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而各国之间的有效合作水平仍然很低，有些国家不具备处理危机的体制能力。中日在将军事力量用于国际安全保障的非战斗性任务，在战后重建、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①因而，中日更多地寻找共同安全利益，更多地加强更具战略性的多边合作，携手为维护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对新时代两国关系及亚洲区域主义构建都是极富意义的创新尝试。

4. 中日人文社会交流规模与深度将持续加大，成为深化合作的新助力。这有助于改善双方相互认知，推动“民心工程”及两国关系基础夯实走深。以 2019 年 11 月启动的中日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为契机，在青少年交流、文化旅游往来、知识舆论界对话的综合支持下，中国民众对日印象将持续改善，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也有望小幅提升。在双方政府推动下，2019 年“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的效果有望持续延伸，以团体访问、修学旅行为主要形式的交流将形成惯例，往来互动将更趋于双向化、深入化。2020 年东京奥运会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到 2021 年举行，同时 2022 年北京也将举办冬季奥运会，奥运经济将刺激双方尤其中国民众旅游人次增长，两国人员往来有望在疫情结束后迎来快速复苏。在“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系列活动推动下，中日文艺界、体育界友好交流将迎来“机会窗口”，为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改善做出贡献。中日地缘相近、人文交流密切，东亚文化中也具备不少的价值认同和思想共鸣，例如儒家文化圈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等。^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都成为中日共同战“疫”的共通人文底蕴和传统纽带。人文因素无疑正助力中日体认人类

^① 2019 年底发生的疫情作为公共卫生事件，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其跨越国界，波及范围广，需要中日通力合作，共克难关。这加强了双方尤其日方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中日探讨全球治理尤其国际公共安全层面的合作将更加有的放矢。

^②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日本举行》，《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26 日。

命运共同体精神要义，在两国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①

（三）同盟疑虑与日本“入亚”对冲

美国的态度及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区域战略有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特朗普信奉“美国优先”，表态“美国不再担任世界警察”，对花费代价去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和推动全球治理不以为然。^② 日美的经济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战略出现某种分歧和差异，最明显的实例就是日本在美国缺席情况下于2018年力促达成CPTPP，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一种自主行为。安倍政府竭力加速与欧洲达成日欧EPA，也没有依照美国的脸色行事。特朗普还不时质疑日本依赖于美国安全保护伞，在其不可预测的领导风格下，这也正被作为敲打、压榨日本的杠杆及工具。这些局面，促使日本要考虑应变的“B计划”，^③ 加大力度改善对华关系，建立某种“日中协调”态势。可以看到，日本也在重新思考日美关系，即至少部分调整对美过分依赖的路径，改为奉行以己为主、日本第一的“用美”策略，不再把是否符合同盟利益作为对外战略制定的第一标准。^④ 安倍政府正试图寻求一种更为复杂和平衡的外交政策，大胆而谨慎地穿行在美亚之间以及经济与安全相生相克的二元区间。

1. 日美摩擦与日本的“战略自主”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通过享受美国的“霸权稳定”——特别是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导性力量，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安全和平的红利。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主要依靠中国的繁荣和依靠美国的安全的局面感到基本满意和放心。但是，当下，日本对这一平衡局面可能结束也即国际大变局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和担忧。这涉及多个因素，包括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动摇，但对日本而言，更主要的应是美中两国权势转移以及美国对外战略及角色扮演的剧烈变化。

对日本的许多人来说，美国的承诺力度和关键作用，无论是对联盟还是对全球自贸体系，似乎越来越值得怀疑。美国似乎打算推卸责任、让地区国

^① 高洪：《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第30—31页。

^② 吴怀中：《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6期，第21页。

^③ 秋田浩之「米国一点張りの落とし穴 アジア安全保障で取るべき道」、『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3月4日。

^④ 杨伯江：《国际大变局：日本的选择与应对》，载杨伯江主编：《日本研究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家自行处理问题，而维持一个越来越像是孤立主义或保护主义的战略。很明显，特朗普不认为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积极参与东亚多边事务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近年来，美国退出 TPP、质疑联盟的价值以及不分对象的贸易战争，使美国的地区盟友或伙伴们不得不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这对日美同盟的稳定构成了一定压力。日本的整个安全战略就是依赖于日美同盟，冷战结束后，如何处理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处理好“同盟困境”中被抛弃的恐惧。尽管日本与华盛顿的军事同盟明显加强，但对美国的戒心仍在继续，也不能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基础提出疑问。两国在经贸、防务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反复出现严重互疑和摩擦，并对两国关系产生了腐蚀作用，多种因素引发了日本重新评估其与美国的关系，减弱了其对完全依赖同盟即能得到安全保障和繁荣环境的信心。^① 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安倍政府对美国不会与中国进行有损日本利益的战略交易始终缺少坚定的信心。

对美国力量主导地位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对该地区承诺减弱的担忧，都将日本推向了一个新的战略对冲方向。这促使其修正对外战略设计的部分元素，不只是做美国的随从，而是积极填补同盟和美国的领导角色，探索与亚洲建立更深层次关系。基辛格曾指出，如果日本看到世界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设法加强安全，而非依赖传统的同盟关系。^② 在安倍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正在膨胀的国际政治雄心以及崛起的地区地位，推动其向亚洲进军的经济、战略和智力行为日益明显。美国战略学家对此的解读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行为使战略自主对日本人颇具吸引力，日本政府采取了更为大胆的外交政策举措，以‘重返亚洲’的方式使日本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关系多样化”。^③

日本历届政府从未像现在的安倍政府这样，敢于或善于偏离美方宏观战略轨道的束缚及规制，以“日本优先”的站位大胆地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也因此，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不乏自主判断和行事，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之际，日本并不完全致力于跟随美国步伐，而是对中美战略竞争采取相对“超然”态度。当特朗普对华挥舞大棒时，安倍却频频对华接近示好，这种“奇特”

① 参见：細谷雄一「外交の新た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https://www.nippon.com/ja/features/c00201> [2019-10-15]；中西寛「日本における『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外交』2018年11・12月号。

②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44—245页。

③ Richard J. Samuels and Corey Wallace, “Japan’s Pivot in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22, 2018, <https://blog.oup.com/2018/07/japan-policy-us-china-relations/> [2020-01-16].

现象引起全球观察人士的兴趣，更使日美两国右翼保守派感到不满。日本不顾美国劝说，变相同意与中国共同建设第三国基础设施（尽管尚不愿公开承认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在是否与中国经济“脱钩”问题上也保持理性判断。日本作为亚太主要行为体，与全球霸权国美国在核心利益的界定方面存在差距，对崛起国中国的反应并不相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东京而言对华急速脱钩不是一个明智策略。日美在应对中国所谓的“重商主义”策略上存在分歧：日本虽然同意美国的观点——必须切实应对中国“市场扭曲”政策，但它提议的是一种地区多边主义偏好的解决办法。从各种情势判断，不管特朗普是否有可能继续担任下届总统，安倍将不得不继续管理不可预测的多重政治经济风险。当前，任何最大化日本国家利益的战略，都需要建立在多向操作、多维平衡的基础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日协调、深耕（依托）亚洲。日本看似走上一条与美国或亚洲都不完全一致的道路，但同盟是存量，“入亚”是增量，日本外交战略的天平向亚洲方向倾斜的趋势难以避免。除非中美关系完全脱钩并战略摊牌，美国迫使其盟友做出从美抉择，否则日本目前的这种“入亚”做法有望得到维持。

2. 日美有关“印太”的分歧与日本的“政经分用”

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在思想与原则以及对该地区的总体战略上，日美之间的看法较为一致，没有重大分歧，但在目标和实施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日美在谈及“印太”时，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地理概念和地理框架。日本的构想在地域范畴上更为广阔，其对印太地域的定义是一直延伸到非洲东海岸，这从日印“亚非增长走廊”的设计规划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比美国版本更宽泛的“印太”概念，因为美方的地理划定基本上与其印太司令部的责权范围相同，即以印度为终点。

更实质性的区别在于，美国和日本对该地区经济贸易的愿景并不完全一致。日本当前的“印太”构想是以推动多边经济互动为主要路径，对其和“一带一路”的对接保持有前提的开放态度。安倍政府的“印太”构想实际上把维护自由贸易秩序以及海上通道安全放在重要位置。自由贸易是日本的立国根基，日本的构想目标是依赖于资源充足的基础设施融资，为区域经济联系奠定基础，并在其中引入中印等国的参与和竞争，这反映在日印推动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以及围绕“一带一路”与“印太”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对接上。^① 亚非

^① 佐々江賢一郎「インド太平洋の新しい国際秩序と日米中関係」、『外交』2019年1・2月号、21—24頁。

急需基础设施投资，日本在亚洲尤其东南亚的高质量基建项目上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战略学家认为，从经济上讲，日本希望通过寻求与东南亚、南亚和东非之间的新依赖关系来重新定位经济重心区域，整个“印太”的经济多样化也将成为建立新的外交和安全伙伴关系的基础。^① 相比之下，美国却漠视这一目标，其“印太”战略被认为侧重于安全色彩，基本属于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责任范围。当然，特朗普政府也谈论自由贸易，但其措辞重点放在“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上，即更多强调的是“公平”而不是“自由”。并且，其“印太”战略建立在与中国竞争的零和观点上，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提议则更加令人失望与担忧。对此，美国智库专家乔纳森·波拉克有如下描述：“美国本能地会与日澳等国加强合作，提供一些与中国竞争的西方基础设施方案，但日本人对此说不，认为应在 20 国集团范围内制定中国可遵守的接触规则。”^②

围绕中美日关系的再平衡和复杂对冲，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也不得不摸索与中日关系发展不相冲突的“印太”构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探索构建一种“日美同盟 + 日中协调”的相对均衡局面。这种偏好实际上也与日本“印太”构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变化相一致，即从侧重安全的战略尤其重点是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和安全伙伴关系，发展为一种更平衡的方式即优先考虑经济供应链和可持续投资。^③ 2018 年 12 月，尽管处在特朗普政府加力使用“印太”战略牵制中国的形势之下，安倍政府仍谨慎地将印太“战略”调整为“构想”，强调包容合作是“印太”构想的指导原则之一，目标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贸易架构，希望与中国一起努力推进区域合作，“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也具对接可能性。^④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体现为以

^① Richard J. Samuels and Corey Wallace, “Japan’s Pivot in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22, 2018, <https://blog.oup.com/2018/07/japan-policy-us-china-relations/> [2020-01-16].

^② Richard C. Bush, “Conference on the Risks to the Asian Peace: Avoiding Paths to Great Power War”, June 25,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on-the-record/conference-on-the-risks-to-the-asian-peace-avoiding-paths-to-great-power-war/> [2020-01-09].

^③ J. Berkshire Miller, “China and Japan’s Pragmatic Peace”, July 1,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7/01/china-and-japans-pragmatic-peace/> [2019-12-11].

^④ 「インド太平洋、消えた『戦略』 政府が『構想』に修正」、『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1月13日。

经济中心与合作导向、政经合流与政略上扬、政略优先与秩序拼争、政经并重与“回归”亚洲为路径的递进性演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由经济区域主义演进到包含政治安全在内的复合区域主义乃至综合型广域地缘战略的进程。目前，第四个阶段仍在发展演化，并可能持续较长时期。根据主要自变量因素发生变化时日本区域战略随之做出相应调整的上述规律总结，可推导出如下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及亚洲共同体发展的上下区间及可能趋向。

未来一段时期，日本区域主义战略调整的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并存，主要受制于上述两大自变量的演变态势，同时受到开始带有独立自变量性质的“体系”元素以及区域合作进程等干预变量的加持影响。当今及未来一段时期，基本可预见或确定的趋势是：（1）两大固有自变量正在发生很大变化。首先，中日国力差距越拉越大，且两国关系大幅缓和改善，开启“新时代”模式。对日本来说，与中国碰撞的代价极大，不搭中国发展便车的损失极大，已经是一种可预期的客观现象和常量系数。其次，“特朗普冲击”使得日本始终难以对美国的承诺和保障感到安心和放心，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以及其政策是否被延续，心有余悸的日本在未来中短期内都要对日美同盟进行“再考察”和“净评估”，政策立足点会置于“日本第一”而非单纯的“同盟优先”，留出战略回旋余地与博弈资本。此两大因素叠加，已经使得日本部分顺应中国发展、“搭车”回归亚洲、依托地区一体化采取对冲战略的趋势不可避免。安倍强调中日关系要由“从竞争到协调”“从威胁到合作伙伴”等就是明证。^①（2）除此之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体系、格局与秩序被认为正在发生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日本赖以生存之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国力量对比与国际权势格局、单极体系与霸权稳定合二为一的舒适环境，都发生了冷战后甚至二战后日本从未遭遇过的激变和不利局面。尤其2018年之后，日本在全球“非典型单极体系”以及区域“不对称两极格局”下对国际地区环境风险格外敏感“脆弱”，^②因而其追随霸权主导国的动力与意愿有所改变也并非异常。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对区域主义的投入并不单单是对同盟的一种补充，也正如亨廷顿早就指出的，“在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竞

^① 外務省「安倍総理の訪中（全体概要）」、2018年10月2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4452.html [2018-12-19]。

^② 阎学通、张旗编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2—91页。

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家利益远比作为西方成员的‘身份’重要”。^① 而基辛格近年针对日本战略动向也曾指出：“日本采取何种同盟关系以实现自己的新角色，取决于其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② 总之，复杂的国际变局及外部形势，使得日本必须以“区域化的全球化”、回归亚洲并推进“亚洲的亚洲化”，来应对全球化变异和国际大变局，对日本的外部资源进行“再平衡”以及对日本的涉外利益进行“再保证”。尤其，如果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特朗普主义”继续发酵，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将加快加大“入亚”步伐和幅度，部分溢出日美同盟框架，积极参与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及共同体建设进程。

当然，也需认清，这种调整是多向对冲的策略行为，处于战略调整的长期通道的端口或是一种战略行为的序曲，但还不是根本性的战略革命举措。这个过程较长且有曲折反复甚至倒退，最终取决于体系与格局演变尤其中美日的发展态势与战略取向，所以其持续性和后续效果还需审慎观察。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国际变局加速演化、中美博弈前景不明并有加剧趋向的情况下，如果美国——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大幅调整“亚洲政策”并改进“同盟对策”，中日美格局及“东西”关系失去最低平衡、亚洲区域合作的宏观条件大幅恶化，则东京有可能发生“保守回潮”，在区域合作上更显政治化、安全化和权力志向。比如，不但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动力不足、态度摇摆，而且附议美欧的相关消极动向及政策逆流，突出“价值观”色彩、强化规则与秩序竞争、转移供应链与生产链、设限科技交流等。这将使其区域主义战略采取更多的保守与对冲政策行为，对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及亚洲共同体建设失去应有的热情和积极性，主要政策着力点仍回置于 CPTPP、日欧 EPA 等广域经贸合作构想以及“印太”地缘政治战略方向上。

面对如此趋向，在国际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国应抓住亚洲区域主义“回潮”并深化发展的窗口机遇期，主张包容而非排他、融合而非疏离，增强对日工作主动性和引导力，加大双方战略对接和互利共赢，以推进亚洲区域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秩序。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美国加强了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压制，为避免两国的战略竞争演变为集团对抗与阵营冲突，保

①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52 页。

②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 244—245 页。

持与大国、周边乃至全球伙伴关系的稳定与健康，促进区域融合与一体化建设进程，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论从理论或现实来看都是必要的路径和选项。^①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稳定与发展中日关系的题中之义。

Japan's Strategy of Regionalism and Asian Coopera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With the Discussion upon Japan's Position and Direction in the Building of Regional Community

Wu Huaizhong

Japan's strategy of regionalism has accelerated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which, fro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new emergence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the American hegemony,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relatively characterized with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riority. The major driving factors of Japan's strategy can be attributed to Japan - U. S. alliance, China's rise and Japan's own identity. Under the typical unipolar world order, it can be further found that the main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have direct impact on the formulation of Japanese regionalism strategy are Japan - U. S. alliance and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erm of national strength, rather than China - U. S. relations. The combin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ose two variables produce four dependent variables, three of which are the cause of difference of thos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bove and the fourth contributes to the further analysis in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article. Since the year 2018,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the world order and the grow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ariables Japan - U. S. alliance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weakening unipolar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hegemony, there is a growing new trend of Asian regionalism and Japan attempts to adjust its strategy of regionalism by adopting the multi - directional hedging, balanc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oals, moving to strengthen the partnership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ose adjustment can be regarded as a prelude of a new strategic trend, which will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in the twists and turns and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relatively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the building of a regional community.

^① 弗朗西斯·福山早在2010年就指出，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曾有遏制中国的构想，但注定无法实现，因为东亚的经济融合过快过深，中日具有良好的经济伙伴关系。参见：フランシス・フクヤマ「多極化世界と日本」、『外交』2010年9月号、28—29頁。

冷戦後の日本の地域主義戦略とアジア情勢の変化

—地域共同体構築における日本の位相と動向への視点を兼ねて論じる—

呉 懐中

冷戦終結後、日本の地域主義戦略の構築が加速された。この戦略の発展は、冷戦後から世界情勢の大変化期まで（1991—2017 年前後）、一極体制、すなわち米国の覇権のもと、経済・貿易協力、政経融合、政略優先などの異なる方向と経路の三つの段階を経ており、範疇・内容・経路・指向性などの面で鮮明な特徴を呈した。その戦略的構造と方向に影響する三つのマクロ要因は、日米同盟、中国の台頭、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集約される。さらにこれらの要素を操作化すると、典型的な一極体制のもとで、日本の地域主義戦略の策定に直接影響を与える主な独立変数は日米同盟の状態や中日の国力の差となり、中米関係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ら二つの変数の組み合わせと相互作用は四つの従属変数を生み出す。そのうちの三つは以上の三つの段階の異なる経路であり、四つ目は本稿第三節で三つの段階から導かれる因果関係をより突っ込んで分析する部分である。2018 年以降、国際情勢が大きく変動し始め、日米同盟の状態と日中の実力差という二つの変数の「共振」が起こり、先験的条件である一極体制引数と米国の覇権からの「デカップリング」（切り離し）やアジアとの融合及び一体化のプロセスの新たな進展によって日本の地域主義戦略に顕著な戦術的調整が起こり、多角的なヘッジ、政経並列、アジア回帰、地域融合という方向へのシフトが始まった。この調整はある種の戦略的動向の端緒にして序曲であり、紆余曲折を経ながらも長く続くであろう。また、これは全体的にはアジア地域の協力と融合、共同体建設の深化に相対的に有利な環境をもたらすことが期待される。

（责任编辑：子尧）